

摇滚歌手、主持人、喜剧演员、运动员、厨师……

# 这届乌克兰议会有点“潮”

■本报记者 刘畅

2019年是乌克兰的政治革新之年。如果说泽连斯基通过3月31日的总统选举将乌克兰带入“素人政治”新纪元的话,7月21日的议会选举就是在此基础上的一次重大洗牌。8月4日,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了最高拉达(议会)选举投票的最后结果,由泽连斯基领导的人民公仆党共获得254个议席(除非控制区外,共424席),赢得了过半数席位,成为1991年乌克兰独立以来首个可以单独组阁的政党。

除了人民公仆大获全胜外,突破议会5%门槛的还有亲俄政治家博伊科和梅德韦丘克领导的反对派联盟(37席),前总理、“天然气公主”季莫申科领导的祖国党(23席),前总统、“巧克力大王”波罗申科不久前草草成立的欧洲团结党(23席),以及摇滚歌手瓦卡尔丘克领导的声音党(17席)。

如果细看这届最高拉达的成员名单,会惊讶地发现这些新议员有着诸多让人眼前一亮的身份:摇滚歌手、主持人、喜剧演员、运动员……这么“潮”的乌克兰议会,开起大会来也许会原地变身为一场嘉年华吧。

**摇滚歌手曾是总统热门候选人**

在诸多不同凡响的角色中,声音党的领袖斯维亚托斯拉夫·瓦卡尔丘克无疑是最耀眼的明星。

这个今年5月为奋战议会选举而专门成立的政党之所以被命名为“声音党”,仅仅是因为瓦卡尔丘克曾是“乌克兰好声音”的资深导师。这一点和泽连斯基倒是很像,毕竟“人民公仆”的名称也来源于由泽连斯基主演的电视剧《人民公仆》。如果进一步“深扒”的话就会发现,这位摇滚歌手与前喜剧演员的成长经历也非常相似。

泽连斯基1978年出生在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经济研究所的网络研究教授,母亲则是一名工程师,比他大3岁的瓦卡尔丘克出生在乌克兰最西部的外喀尔巴阡州的一个高知官员家庭,父母都是物理学家,父亲伊万·瓦卡尔丘克还做过多的利沃夫大学领导,在2007年至2010年间更是担任乌教育和科学部部长。受家庭教育影响,瓦卡尔丘克本人也曾攻读物理学,并获得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

人生的奇妙就在于,永远不会按照设定的剧本行事。曾在基辅国立经济大学攻读法律的泽连斯基,最终在17岁那年走上演艺的道路。在往后的岁月里,经过一番奋斗,在演艺圈里干得风生水起。瓦卡尔丘克也一样,尽管有一颗物理学家的头脑,却在19岁的时候选择成立了摇滚乐队Okean Elzy,并担任主唱。在之后的20年里,逐渐成为乌克兰首屈一指的摇滚明星。2014年6月,在Okean Elzy成立20周年之际,瓦卡尔丘克在基辅奥林匹克球场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纪念音乐会,大约有7万人参加了那场音乐会,刷新了乌克兰明星受欢迎的纪录。

瓦卡尔丘克受欢迎是有道理的,他的歌中经常诉说着爱国的理想,特别是在乌克兰危机之后,面对东部持续不断的战争和遍体鳞伤的国家,瓦卡尔丘克用歌声呼吁停战。他曾在一首名为《墙》的歌曲中,让乌克兰人直面内心,冲破看似坚不可摧的“心墙”。

2013年至2016年,在乌克兰政局最为动荡之时,瓦卡尔丘克受邀担任“乌克兰好声音”导师,在该国最大的音乐节目舞台上表达观点,加上充满家国情怀和政治批评的歌词寓意,成就了瓦卡尔丘克意见领袖的地位。到2018年上半年,瓦卡尔丘克已经成为

乌克兰最受瞩目的政治明星。一项民调显示,约38%的受访者表示支持瓦卡尔丘克竞选成为新总统。

但是故事到这里才进行到一半。2018年下半年,瓦卡尔丘克一直对竞选总统一事心有戚戚,迟迟未能“狠”下决心参选。这或许缘于他之前一段不成功的从政经历:2007年至2008年,他就曾短暂地担任过拉达议员。不过根据《新东欧》杂志的描述,在2008年9月,由于见识到前总统尤先科和前总理季莫申科的政治斗争,瓦卡尔丘克对政治心灰意冷,提前辞去了议员职务,回到了音乐界。

此后,瓦卡尔丘克曾多次在媒体表示自己对总统职位没有野心。在他看来,即便是泽连斯基,也没有摆脱“霍布斯

式”的命运,泽连斯基与寡头科洛莫伊斯基之间“扯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让他对政治“深深感到失望”。

与泽连斯基愿意面对现实相比,瓦卡尔丘克更像个理想主义者,他希望凭借一己之力改变乌克兰的政治文化。他认为与总统相比,议会才是实现政治理想的地方,于是决心参加议会选举。曾有传言称,因担心不能单独执政,泽连斯基愿与瓦卡尔丘克组建执政联盟,但据称到前总统尤先科和前总理季莫申科的政治斗争,瓦卡尔丘克对政治心灰意冷,提前辞去了议员职务,回到了音乐界。

相比于瓦卡尔丘克对歌坛“流连忘返”,泽连斯基的人民公仆党周围倒团

结了一众“死心塌地”的“能人异士”:比如同为人民公仆成员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亚历山大·斯基奇科,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乌克兰富豪列昂尼德·尤里舍夫的女婿。又比如体格健壮的摔跤手让·别列纽克,这位年仅28岁的乌克兰和卢旺达混血儿从9岁起开始练习摔跤,此后20年一直以运动员的身份出现在各大国际赛事中,却突然摇身一变成为最高拉达议员,当然别列纽克也承诺要发展乌克兰的体育,促进国民健康。再如曾

经的主持人和厨师尼古拉·季先科,因为多年担任主厨并有成功经营餐馆的经历,他承诺成为议员后要关注青少年的饮食健康……

不过最让人侧目的还是未来要帮助

泽连斯基处理外交政策的新当选议员斯维亚托斯拉夫·尤拉什,这位1996年出生的年轻议员今年才23岁,从其脸书个人主页看到,他竟是位政坛老将。2014年乌克兰危机期间,年仅18岁的他从印度回到乌克兰,成立亲欧美的示威新闻中心,支持波罗申科推翻亲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并因此获得波罗申科亲自授予的勋章。

但5年之后,尤拉什重新做了选择。今年2月,他加入了泽连斯基的团队,出任总统外交政策和数字化外交方面的顾问。他表示愿意100%相信这位代表民意的新总统,而已经拥有5年从政经验的他也能在泽连斯基的统治下“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一周封面



《时代》 8月 13 日

**“白人至上”主义正扩散**

当提到恐怖分子,大多数美国人脑海中会浮现“9·11”袭击者的形象。人们可能不会想到一个来自繁华的达拉斯、年仅21岁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他驾车去了埃尔帕索,在沃尔玛超市将22人射杀。如今“白人至上”主义者已成为美国恐怖主义的代言人。

据统计,自“9·11”恐怖袭击以来,“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其它极右翼极端分子袭击美国的次数几乎是伊斯兰极端分子的3倍。2009—2018年,极右翼导致了美国国内73%的极端主义致命性事件。而埃尔帕索当天死亡的人数就超过今年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战场上阵亡士兵的总数。

执法官员认为,“白人至上”主义的“癌细胞”正向社交网络的黑暗角落扩散,导致杀手间相互模仿、相互学习甚至相互超越。

近年来,美国联邦调查局一直发出警告——来自国内的威胁不断上升。但这并没有引起白宫的重视。作为总统的特朗普也一直淡化“白人至上”主义者给美国构成的威胁,他说“他们只是一小批人”。



《新政治家》8月

**英国的“美国化”进程**

英国保守党一直以来无法摆脱自由市场经济学的指导。自约翰逊上台以来,内阁“大换血”后,如今的保守党内自由主义者的比例正在提升。

7年前,5位保守党右翼国会议员一同撰写了名为《释放大不列颠》的著作,这本书歌颂了政府放松管制、减税、私有化等自由主义的举措。

这本书的合著者现在都成了内阁要员:拉布担任外交大臣、帕特尔成了内政大臣、特拉斯成了国际贸易大臣。他们和主张国家干预的特雷莎·梅非常不同。

正如约翰逊所威胁的那样,“无协议脱欧”能够创造条件让英国实施正常时期无法施行的政策,在他的领导下,英国正在走向完全“美国化”的市场和社会。



《纽约客》8月 19 日

**托尼·莫里森逝世**

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在13日去世了。她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是工薪阶级家庭中排行第二的孩子。

莫里森开始时是一名编辑,培养了一代黑人作家。之后她自己也成了一名作家,撰写了一系列小说、评论、散文和演讲稿,这些作品被认为是美国文学的里程碑。本期《纽约客》以她的剪影为封面,题为“一如既往的安详”。



从左至右分别为摇滚明星瓦卡尔丘克、摔跤手别列纽克、主持人兼厨师季先科,如今他们都是乌克兰议会议员。

**约翰逊携一批昔日最佳辩友成立“硬脱欧”内阁**

# 牛津辩论队能带领英国“脱欧”吗

■本报见习记者 吴姝

前不久,英国首相约翰逊在下议院的辩论首秀视频红遍网络。在与反对党领袖科尔宾的激辩中,约翰逊语速惊人、表情到位、举证丰富,甚至还洞开地联系恐怖片《天外魔花》的片尾,大声发出对科尔宾的控诉:“这位一直对欧洲持有怀疑态度的人,他早就被外星人抓走了,在惨遭割喉后,被身边人重新编码成了现在的这个复制品!现在这个留欧派!”

约翰逊的辩论鬼才并非一朝一夕练就。追溯上世纪80年代的牛津大学辩论社,在那里诞生了当今英国政坛上强硬“脱欧”派的最佳辩手们。约翰逊在1986年当选该社主席。两年后,该社主席由现任内政办公厅大臣戈夫担任。而新任议会下院领袖雅各布·里斯-莫格也是那时辩论社的明星。

正如英国前副首相赫塞尔廷所说,牛津大学辩论社主席一职是“成为首相的第一步”。30年后,约翰逊、戈夫和里斯-莫格,把辩论社中的峥嵘岁月搬上了当今下议院的舞台。但由他们领导的“脱欧”,会不会成为一出牛津辩论社老男孩们主演的闹剧呢?

牛津大学政治学系毕业生、曾担任辩论社主席的贾雅·威尔逊近日发表一篇专栏文章,回忆与约翰逊在辩论社的接触和往来。她指出,牛津时代的约翰逊留给她的印象就让她预感到,约翰逊将成为一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首相。

威尔逊说,她第一次见识约翰逊的傲慢是在新生辩论赛上。刚从澳洲回国的约翰逊在辩论中多次引用瑙鲁的例子,威尔逊不得不一次次站起来反驳他关于瑙鲁不准确的说法。赛后,约翰逊带着轻松的笑容来找威尔逊,用丘吉尔似的口吻说道:“我竟不知道在场有人了解瑙鲁的事情!”

还有一次,约翰逊在政治学院的夏季舞会上不请自来。当时,作为学院学生会主席的威尔逊曾放言,除非约翰逊自己想办法拿到入场券,否则他会拒之门外。当约翰逊笑脸盈盈地出现在她面前时,他不得不承认,自己谎称是她的舞伴才得以进入。不过,约翰逊来到舞会的真正目的是为竞选辩论社主席拉票。

约翰逊竞选辩论社主席的历程并不顺利。在第一年竞选失败之后,他选择隐藏起自己的政见,假装支持当时很受欢迎的社民党人。在第二年成功当选为主席后,才重新披上保守党的战袍。当时,

帮助约翰逊做民调的弗兰克·伦兹劝他不要这么做:“因为这是个很小的地方,你可能招致报复。”幸运的是,这种事没有发生。约翰逊凭借百折不挠的意志和投机取巧的大胆方式,终于在1986年得到了想要的职位。因此,威尔逊认为,作为新任首相的约翰逊,也会和学生时代一样,为实现自己的目标“不择手段”。

1985年入学的丈夫就是约翰逊的“迷弟”。他在辩论社的酒吧里第一次见到约翰逊,“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友善的风云人物,就像一只巨大而温良的姥鲨站在那儿,等待着新生像鱼儿似的朝他游去。”戈夫曾告诉约翰逊的传记作家:“我就是鲍里斯的配角,我成了鲍里斯的拥趸。”之后,戈夫成为约翰逊辩论社主席竞选团队中的一员,帮助约翰逊上位。30年间,约翰逊和戈夫的友情虽然经历了磕磕绊绊,戈夫数次想与约翰逊竞选保守党党首一职,但在“脱欧”大业面前,戈夫又担当起过去的角色——成为约翰逊的左膀右臂。约翰逊出任首相后,立刻提携戈夫为内阁办公厅大臣,成为筹备“无协议脱欧”的“战时内阁”的主要领导者。

里斯-莫格在1988年入学,若对比当时他作为一名“有进取心的新生”登上校报的照片,30年后成为议会下院领袖的里斯-莫格,仍保持着西装笔挺、神采奕奕的风范,甚至连发型也没有改变。这位牛津辩论社出色辩手,已经成为强硬的“脱欧”派。早在卡梅伦时期,他就因在下院辩论中出色的口才而闻名。

其实,包括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前外交大臣、保守党首最有竞争力者亨特,前国际开发大臣斯图尔特,他们都是那时的牛津毕业生,但他们学习的是另一个“首相专业”——哲学、政治与经济学(简称PPE)。在2016年公投中,从牛津PPE专业一等学位毕业的政要基本都投下了“留欧”的一票。

而学习古典学的约翰逊、学习英国文学的戈夫和学习历史的里斯-莫格,这些喜欢在辩论社中引经据典、唇枪舌剑而不太专注学业的毕业生们都成了“脱欧”派的旗手。

如果说这是一场牛津大学校友间的争斗,“脱欧”派的胜利可以说是辩论社的胜利。但让人担心的是,辩论并不关心真正的政策,只关心如何用辩论技巧、政治野心来赢得满堂喝彩。正如西蒙·库珀在《金融时报》上写道:“他们只是辩手,不是政策制定者。他们不可能说服欧盟屈服,因为欧盟谈判者们遵守规则。”

# “政坛网红”们的社交媒体策略

■陈佳骏

“如果不是推特,我可能不会在这儿。”就在美国总统后不久,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塔克·卡尔森的采访时曾这样说过。确实,特朗普运用社交媒体进行竞选、治国、外交的非传统领导模式引起全球政界、学界和媒体界的广泛关注。这种独特的领导模式也纷纷被多国政坛人物竞相模仿。

在社交媒体引领时代潮流的当下,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其一,为何越来越多的政坛领导人热衷成为“网红”?其二,为何近年来出现的“政坛网红”多半被贴上“民粹主义”标签?

关于第一个问题,“政坛网红”的层出不穷或许要归功于“后真相时代”的到来。当前,社交媒体已经将全球引入一个“后真相时代”。所谓“后真相”,根据《牛津词典》的定义,意思是“诉诸情感与个人信仰比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换言之,民众更愿意相信自己看到和听到的,而不愿意相信由精英化的媒体机制所生产与传播的信息。对于政坛人物而言,他们在“后真相时代”不得不越过专业媒体这个传统中介,运用起社交媒体与民众一起卷入舆论场,进行“面对面”的直接对话,从而成为民众想看到和听到的“理

直播帖子得到800多万次浏览。博索纳罗深谙“后真相”的精髓,努力在选民面前展现他们想要看到和听到的信息。他将社交媒体炉火纯青的运用为他的当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博索纳罗也被认为是“特朗普式”的民粹主义领导人,从中可以看出,大众政治“面对面”互动“后真相”的叠加确实会激化民粹主义领导人的产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第二个问题。但就此将善用社交媒体的政坛人物与民粹主义划等号未免显得过于草率。最有力的一个反驳例子是,第一个意识到新媒体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冲击力的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从没有被人们认为是民粹主义者。2008年,奥巴马通过互联网进行每笔仅10美元、20美元的小额筹资,最后居然筹到超过6亿美元的竞选资金,创下当时的纪录,并最终问鼎白宫。

再比如近年来发生在印尼大选中的现象,从2014年一直竞争到今天的政坛“死对头”佐科和普拉博沃都善于运用社交媒体,但只有前者被认为是反建制的,

而后者则被认为代表着传统政治势力。

事实上,仔细观察那些民粹主义“政坛网红”,他们在媒体策略的运用上普遍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社交媒体视为系统性媒体策略的一部分而非全部。这就是英国拉夫堡大学政治传播学教授所说的“混合媒体系统”,这个系统既包括传统媒体也包括社交媒体。在“混合媒体系统”中,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形成的是一种递归循环,例如民粹主义政客与他们的追随者在社交媒体上共同制造话题,将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串联起来,模糊新闻与观点之间的界限。

这种媒体策略在当下的年轻政客中十分流行。特别是在近年来民粹主义蔓延的欧洲大陆,利用混合媒体策略当选国家领导人的年轻政客更是不胜枚举。年轻政客充满活力与希望的形象在电视这种传统媒体上拥有天然的优势。在5年前异军突起的西班牙左翼年轻政客伊格莱西亚斯看来,“真正搞政治就是在电视和报纸上来看,这要比在议会中搞重要得多”。与此同时,年轻政客对社交媒体,但只有前者被认为是反建制的,

体也驾轻就熟,可以轻而易举地与“千禧一代”网民构建起联系。

用混合媒体策略当选国家领导人的最新例子是乌克兰新总统泽连斯基。作为曾出演热门电视剧《人民公仆》的喜剧明星,泽连斯基从竞选开始就将电视剧名作为创建党派的名称,做大“人民公仆”的个人品牌。竞选过程中他还避开官方集会或政治演说,取而代之的是在社交媒体“照片墙”上发布许多欢快的视频。

泽连斯基成功借用了电视剧中他扮演的“总统彼德洛维奇”的清廉形象,同乌克兰的寡头政客们做了切割,在选民面前展现了一个他们心目中理想的领导人形象。我们并不确定乌克兰选民是否意识到他们到底是在选一个虚拟人物还是在选真实的国家领导人,但泽连斯基将电视媒体上虚构总统的形象投射到真正的候选人身上,这对于混合媒体策略而言,可以说是一个教科书般的范例了。(作者系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